

THE SCHOLAR

第5辑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學人

文子
人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学人(第五辑)

主 编:王守常 汪 晖 陈平原

责任编辑:朱建华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淮阴新华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.25 插页 4

字数:450,000 1994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,5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635-9/I · 613

定 价:9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	王元化(1)
“假设”与“求证”	
——胡适的文学史研究	陈平原(25)
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产生	王培元(63)
东方女性的文化立场	
——论向田邦子	孙 歌(91)
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	李 零(115)
中国古代绘画中的隐逸精神	高建平(151)
文献,思想与阐释	
——关于禅思想史的研究	葛兆光(199)
传统训诂方法的可行性及其局限	张 猛(247)
论《春秋左传》中的“德”观念	陈 铮(267)
阴柔之美的审美定式	
——中国戏剧中人神恋神话原型研究	章俊弟(291)
马一浮的心物论与中国哲学的唯心传统	陈 来(309)
唐牟徐合论	郭齐勇(331)

论 30 年代的舆论环境和国民党党报的特色	蔡铭泽(363)
论“方法”及“方法论”	
——以近代中国史学意识为系络	黄进兴(391)
史学的终结与最后的“中国通”	
——从现代美国思潮谈到近年来的中近史研究	
.....	梁元生(413)
学术史研究笔谈	
长时段与短时段的辩证结合	
——谈谈政治文化史学的兴起	高 毅(449)
后现代主义·现代性	
——中国文化史研究?	陈建华(457)
历史学的困境与史学家的命运	董正华(461)
钱钟书《围城》中的流放问题(英文)	[美]季安纳·夸奇(465)
崇祯十七年之“从逆”问题与江南社会(日文)	[日]岸本美绪(499)
作者简介	(535)
《学人》1—4 辑目录	(539)

Contents

- Du Ya-quan and the Debate o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
..... Wang Yuan-hua
- Hypothesis and Justification Chen Ping-yuan
——Hu Shi's Researches on History of Literature
- The Disillusion of Sinocent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Patriotism
in Modern China Wang Pei-yuan
- Cultural Attitude of Oriental Women Sun Ge
——On Mukouda Kuniko
-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nd Mythological Legends
..... Li Ling
- Reclusive Spirit in Ancient Chinese Paintings ... Gao Jian-ping
- Textual Sources, Thinking and later pretation
..... Ge Zhao-guang
——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"Zen" Thought
- The Practicability and Limit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
Philological Method Zhang Meng
- The Idea of "De" (Virtue) in the *Zuo Zhuan* Chen Zeng
- Aesthetic Appreciation of the Feminine-like Beauty
..... Zhang Jun-di
——An Archetypal Study of Divine-human Love Myth in
Chinese Drama

Ma Yi-fu's Theory of the Nature of Mind and the Idealist Tradition in Chinese Philosophy	Chen Lai
On Tang Jun-Yi, Mou Zong-san and Xu Fu-guan	Guo Qi-yong
On the Press Environment in 1930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. N. P. 's Organ Press	Chai Ming-ze
On "Method" and "Methodology"	Huang Jin-xing
— A Perspective from the Historiographic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China	
The End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Last "China Hand"	Liang Yuan-sheng
— From Contemporary Trend of Though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Rec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	
Discussions on th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Learning: The Dialectical Synthesis of Long-term and Short-term	Gao Yi
— The Rise of Historiography of Political Cultures	
Postmodernism • Modernity	Chen Jian-hua
— Some Thoughts o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	
The Predicament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Destiny of Historians	Dong Zeng-ping
The Question of Exile in Qian Zhongshu's Novel <i>Fortress Besieged</i>	Gianna Quach
The "Traitors" Scandal of 1644 in the Jiangnan Local Society	KISHIMOTO Mio

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

王元化

内 容 提 要

杜亚泉是在近现代之交学术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，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〇年，任《东方杂志》主编。本文介绍了杜亚泉的学术思想，阐释了他在政治上的民主思想，在革新运动中的温和渐进立场，和在文化上的中西调和论。同时，对他和陈独秀之间所发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，作了再认识、再估价，使久被湮没的历史人物有了再现其真实面目的机会。作者认为这场发生于“五四”时期的论战，其规模之宏伟，讨论之深入，都驾凌在其后的几次论战之上，而其中有关道德继承问题的探讨，至今仍有意义。作者还接触到“五四”的另一面，对这场论战中所出现的意图伦理和功利主义倾向作了评估。

—

杜亚泉，1873年（同治十二年）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伦塘乡（今上虞市长塘）。原名炜孙，字秋帆，又署伦父。少时刻苦自修，精

于历算,通日语,长于理化、矿物及动植诸科。他的治学道路颇曲折,青少年时,即觉帖括非所学,改治训诂,甲午后,又觉训诂无裨实用,再改学历算。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,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。越二年,为提倡科学,培养人才,创办亚泉学馆(后改为普通学书室),同时出版《亚泉杂志》。(案亚泉二字为氩、镍之省笔。氩是一种惰性化学元素;镍在几何学上无体无面,这两个字原表示自谦之意。可是他没有料到,氩在今天已成为具有广泛用途的重要元素了。)1903年(光绪三十年)应商务印书馆夏粹芳、张元济之邀赴沪,将其普通学书室并入商务,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,负责编辑教科书。(王云五《小学自然科词书序》称:经他负责编辑的教科书不下百余种之多。笔者少时读代数所用的盖氏对数表,就是他编的)。至今仍在延用的化学元素中文译名也是由他所手定。袁翰青《中国化学史论文集》所举重要论文有四篇是他发表在《亚泉杂志》的文章。由于这些成就,人们称他是“中国科学界的先驱”、徐寿以后至二十世纪初,成绩卓著的学者。他在主编任上,奖掖后进,做了不少工作。后来,胡愈之回忆在《东方杂志》当编辑时说,曾得到他的细心指导,并称他是忠厚长者,治学严谨,办事踏实。(见胡序文《胡愈之和商务印书馆》。)

1911年(宣统三年)至1920年(民国九年),杜亚泉掌《东方杂志》笔政,前后凡十年。他出任主编后,刷新内容,扩大篇幅,使这个刊物成为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杂志。除主持编务外,他还勤于著述,著有《人生哲学》,译有叔本华《处世哲学》。他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论文达二百篇。其中有些文章,今天读来,仍有一定启迪作用。后人在他去世后,曾对他作了中肯的评价:“其对于人生观和社会观,始终以理智支配欲望为最高理想,以使西方科学与东方文化传统结合为最后目的。先生实不失为中国启蒙时期的一个典型学

者。”(《东方杂志》编辑部《追悼杜亚泉先生》，本文为胡愈之执笔)蔡元培也说他“以科学方法研求哲理，周详审慎，力避偏宕。”(《书杜亚泉先生遗事》)他在胡适以前，首开以科学方法治学的风气。虽然今天看来，科学主义不免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少弊端，但他在运用科学方法解释社会问题时，却比今天一些号称运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青年学者，要通情达理得多。

“五四”时期，发生了东西文化问题论战。这场论战肇始于《新青年》主编陈独秀批判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。不久，杜亚泉于1920年迫于情势(受论战影响)辞去主编职务，同时也不再为杂志撰稿，仅担任编辑课本工作，同时创办新中华学院，两年后因经费告绌而停办，负债数千元。淞沪战争爆发，商务毁于日军炮火。杜亚泉举家避难回乡。次年，患肋膜炎，十二月六日逝世，享年六十岁。他在病时，无钱医治，下葬时借棺入殓，身后萧条，令人倍觉凄凉。张梓生于《新社会》半月刊撰文悼念，言词极为沉痛：“国人对于人物之崇仰，久失其正鹄。当曲园之死，举国淡然，时王静安已有所感。近则时局变幻，人心愈趋卑下，对数政客官僚之死亡，报纸争载，市巷纷谈；而对于品格崇高，行足讽世之学人之逝世，除三数熟友外，类皆无所感怀。”

二

杜亚泉逝世后，不但他的生平和功业很少有人提及，就连他的名字也似乎渐渐湮没无闻了。解放后所出版的现代思想史论，对“五四”前后那场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战，未置一词。这场论战就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来说，是远远驾凌于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、民族形式问题论战等之上的。根据现在涉及杜亚泉的几篇文章来看，

却是毁多誉少，有的甚至把他诋为落伍者。现在是应该对他作心平气和的再认识再估价的时候了。

杜亚泉在任主编前就已经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文章。最初两篇文章是《物质进化论》和《伦理标准论》，接着一篇一篇源源不断。就这些文章看，他不仅是启蒙者，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。1912年他在《减政主义》一文中说：“今各国政府组织繁复之官僚政治，视社会上一切事务均可包含于政治之内，政府无不可为之，亦无不能为之。政权日重，政费日繁，政治机关之强大，实社会之忧也。”他认为政府对于社会，只能养其活力的源泉，而不要使之涸竭，只能顺其发展的进路，而不要设置障碍。只有这样，社会的活力才能得以顺畅发展。所以政府在教育事业和工商事业方面，仅仅是司其政务，而不必自己去做教育家，自己去经营工商事业。要使教育发达，并不是政府多颁学堂章程，多编教科书。他说：“不察此理，贸贸焉扩张政权，增加政费，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，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。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，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。”这种观点在其他文章中（《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》、《个人与国家之界说》等）亦多有阐发。

照杜亚泉看来，保证社会不发生专制集权现象的重要条件之一，就在于要有一个民间社会的独立空间。政府需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，才可以避免对于社会进行过多的干预。他认为社会活力具有伟大的创造力量，一国的兴衰就视其社会活力是受阻而涸竭，还是相反得到了通畅的发展。这一观点十分近于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契约论。近年来，海外学术界重新探讨了黑格尔等市民社会理论，大多认为如果无条件地承认国家至上独尊的地位，就会导致国家对人民权力的剥夺或侵吞。杜亚泉在《个人与国家之界说》中，也批判了国家主义“强他人没入国家”与“强个人没入国家”的现象，

说这是“侵犯他人的自由，蔑视基本人权”。他在《论思想战》中，把这种自由思想阐发得更为透彻。这篇文章提出四项原则，前面两条说的是开浚与广博思想，属于思想修养的问题。后两条，一条是“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”，另一条是“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”。这种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观点，固然来自传统资源，但杜亚泉使它和现代民主思想接轨。数十年后，胡适声称他认为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是自由主义的一项重要原则。在那场论战中和杜亚泉站在对垒地位的陈独秀，到了晚年也说，承认反对党的自由乃是自由的要义。但他在那场论争中，曾经是多么疾言厉色地批判了杜亚泉。杜亚泉写的《中国之新生命》一文也是十分值得注意的，其中提到中产阶级问题：“现今文明诸国，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，我国将来也不能出此例。此则吾人之所深信也。”他在“五四”前后就提出这些看法，说明他的思想敏锐，这使他在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占据了领先的地位。

三

我认为把杜亚泉看作是一位反对革新的落伍者，这种误解要归之于长期以来近代中国在历史上发生的急骤变化。近代史上的每次改革都以失败告终。鸦片战争后，以曾李为代表的洋务运动，希望从西方引进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等科学技术。可是甲午一战，惨遭失败。继起者认识到不经过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，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孤立地发展的，于是出现了康梁维新运动。辛亥革命成功，以共和代替了帝制。但政治情况却并未改善，军阀割据，连年混战，民不聊生。在共和制下，竟出现了议会贿选，政客收买猪仔议员的丑剧。继起者再一次认识到共和政治制度只能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和

思想基础上形成。于是“五四”的思想革命诞生了。百余年来不断更迭的改革运动,很容易使人认为每次改革失败的原因,都在于不够彻底,因而普遍形成了一种越彻底越好的急躁心态。在这样的气候之下,杜亚泉就显得过于稳健、过于持重、过于保守了。

对于改革,杜亚泉却有他自己的看法。他在《个人之改革》一文中,阐明了他的改革观念:“吾侪自与西洋社会接触以来,虽不敢谓西洋社会事物悉胜于吾侪,然比较衡量之余,终觉吾侪之社会间,积五千余年沉淀之渣滓,蒙二十余朝风光之尘埃,症结之所在,迷谬之所丛,不可不有以廓清而扫除之。故近二三十年以内,社会变动之状况,虽左旋右转,方向不同,而其以改革为动机则一也。社会间稍有智能之人士,其对社会之运动,虽温和急进,手段不同,而其以改革为目的则一也。改革云者,实吾侪社会新陈代谢之机能,而亦吾侪社会生死存亡之关键也。”他清楚说明改革是他坚定的信念,这里没有什么虚饰或权辩,他对改革是真诚的。可是至今人们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渐进温和的态度。四年后,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爆发,他的东西文化调和论,被陈独秀斥之为“人类惰性的恶德”。陈独秀持急进彻底态度的原因,可用他在《调和论与旧道德》中的几句话来说明:“譬如货物买卖,讨价十元,还价三元,最后结果是五元。讨价若是五元,最后的结果,不过二元五角。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。”《新青年》同仁中也有人说过类似讨价还价的话。这种要求彻底的态度一直延续到数十年后的政治批判运动中。由于矫枉必须过正,以致形成以偏纠偏,越来越激烈,越来越过于极端。

杜亚泉主张温和渐进改革的理论根据,他在《接续主义》(1914年)一文中曾加以阐明。接续主义是德国学者佛郎都在其《国家生理学》一书中的用语。接续是指旧业与新业接续而成,不可割断。杜文说:“接续主义表示,一方面有开进的意味,一方面又含保守意

味。”他认为有保守无开进，则拘墟旧业；有开进无保守，则使新旧中间的接续中断。在近世国家中，英美两国都是开进和保守二者兼备。他大概是最早把保守和开进结合起来，并揭示保守的积极意义。他说：“所谓保守者，在不事纷更，而非力求复古。”可见他是从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使用保守一词的。在这篇《接续主义》中，他根据以往的历史，指出当时如果复古，结果将是摧折新机，动摇国本。历史是不能倒退的，法国革命后屡次复古卒不成功，汉高欲复封建为张良所阻。假使今日俄国欲复彼得大帝以前之旧法，日本欲行明治维新以前之旧制，世人岂不“皆知其不能，皆识其不可”？他引孟子的话：“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，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。”接续主义正是出谷迁乔，而不是相反下乔入谷。他说：“水之流也，往者过，来者续，接续者如斯而已。若必激东流之水，返之在山，是岂水之性也哉。”

四

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的一个插曲：关于新思想问题的争论，是值得注意的。这一争论涉及到理性与感情问题。1919年，蒋梦麟在《晨报》发表《新旧与调和》一文，虽然没有提杜亚泉的名字，实际上却是对他的调和论提出批评。蒋梦麟的文章说：“新思想是一个态度，这一态度是向那进化一方面走，抱这个态度的人视吾国向来的生活是不满的，向来的思想是不能得知识上充分愉快的。”杜亚泉在《何谓新思想》中争辩说：“态度非思想，思想非态度”，态度是心的表示，且常属于情的表示；思想为心的作用，且专属于智的作用。二者不能混同。对向来的生活与知识感到不满足、不愉快，是一种感情，感情不是思想。主张推倒旧习惯，改造旧生活旧思想，是一种

意志，意志也不是思想。接着，蒋梦麟再为“新思想是一种态度”的观点进行辩论，认为态度与思想并非毫无关系，“态度变了，用官觉的方向就变，感情也就变，意志也就变，理性的应用也就变。”这篇文章刊载于《东方杂志》，文末附有杜亚泉的按语。按语再驳蒋说：“以感情与意志为思想之原动力，先改变感情与意志，然后能发生新思想，是将人类的理性为情欲的奴隶。先定了我喜欢些什么，我要什么，然后想出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及要的缘故。此是西洋现代文明之病根。”这里所说的西洋文明的病根，即杜亚泉在下文中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西方以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、竞争主义等等名目，作为发动战争、进行侵略的藉口。杜亚泉曾多次撰文对这种行径加以指摘，并引俾斯麦回答奥人的话：“欲问吾开战之理由耶？然则吾于二十四小时寻得以答之。”认为这正是先有了要什么的态度再找理由去说明的生动例证。

这一问题的讨论，具有普遍意义。许多人至今仍相信思想取决于态度的正确。解决思想问题，不是依靠理性的认识，而是先要端正态度，先要解决爱什么，恨什么，拥护什么，反对什么的问题。这种态度决定认识的观点，正是马克斯·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(an ethic of intentions)，我们都十分熟悉意图伦理的性质及其危害，它使学术不再成为真理的追求，而变成某种意图的工具。这种作为意图工具的理论文章，充满了独断和派性偏见，从而使本应具有的学术责任感沦为派别意识。杜亚泉为了说明仅仅从感情冲动出发的不可靠，再援历史为证。他说：“英国十九世纪初期，劳动者以生活困难之要求，闯入工场，摧毁机器，仅有感性的冲动，而无理性的作用者，即因社会主义新思想尚未发生彼等心意之中也。”

像杜亚泉这样坚持理性的人，不可能不对我国历史作出冷静思考。他的《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》(1919

年)一文将中国历史划为三个时期,文中以大量篇幅谈到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。他说游民是过剩的劳动阶级,即没有劳动地位,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,其成分包括有兵、地棍、流氓、盗贼、乞丐等。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中力量强大,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,对抗贵族阶级势力。他认为“秦始以后,二十余朝之革命,大都由此发生”。可是革命一旦成功,他们自己也就贵族化了。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,而社会组织毫无更变。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,也不是社会革命,只能说是“帝王革命”。游民和知识阶级结合,就产生了游民文化。这种文化以尚游侠,喜豪放,不受拘束,不治生计,嫉恶官吏,仇视富豪为其特色。

杜亚泉认为知识阶级缺乏独立思想,达则与贵族同化,穷则与游民为伍,因而在文化上也有双重性。一面是贵族性,夸大骄傲,凡事皆出于武断,喜压制,好自矜贵,视当世人皆贱,若不屑与之齿者。另一面则是游民性,轻佻浮躁,凡事皆倾向于过激,喜破坏,常怀愤恨,视当世人皆恶,几无一不可杀者。往往同一人,处境拂逆则显游民性,顺利则显贵族性;或表面上属游民性,根底上属贵族性。他说,以此性质治产必至于失败,任劳动必不能忍。这些说法都道人所未道。游民和游民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,很少被人涉及,但是研究中国文化就不能不注意这个问题。

五

陈独秀所质问的《东方杂志》的三篇文章,均发表于1918年。它们是杜亚泉的《迷乱之现代人心》,钱智修的《功利主义与学术》,平佚编译的《中西文明之评判》。当时正是一次大战之后。论战发生的前一年,杜亚泉撰《战后东西方文明之调和》,说“此次大战使

西洋文明露明显之破绽”。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意见，海外学人甚至谈得更多。杜文又说：“十九世纪科学勃兴，物质主义大炽，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说，叔本华之意志论，推而演之，变成强权主义。其尤甚者，则有托拉邱克及般哈提之战争万能论。不仅宗教本位之希伯来思想被其破坏，即理性本位之希腊思想亦蔑弃无遗。现在道德观念，竟以权力或意志为本位，而判定是否道德，则在力不在理。战争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，而委罪于弱国之存在，于是弱者劣者为人类罪恶之魁。”这种估计虽然不免夸大，但事实却是存在的。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，提出东西文化的调和论的。《中西文明之评判》这篇文章译自日本杂志《东亚之光》，其中介绍了三位西方学者台里乌司、弗兰士和普鲁克陀尔福对中国学者胡君的著作的意见。日音胡、辜相近，胡乃辜鸿铭之误译。辜书曾以德文在德发行，一本是《中国对欧洲思想之辩护》，另一本是《中国国民之精神与战争之血路》。其内容要旨是说以孔子道德伦理为代表的中国文明，实优于基于物质主义的西方世界观。台里乌司对辜说表示同情，而弗兰士则力辟其妄。陈独秀质问的另一对象是撰写《功利主义与学术》的钱智修。钱又署坚瓠，为杜亚泉在商务的同仁，他与陈寅恪曾在复旦公学同学，1920年杜亚泉辞职后，钱继掌《东方杂志》的笔政。钱对改革的看法与杜相近。他有因革说：“因者，取于人以为善，其道利在得。革者，创诸己而见长，其道利在异。因革互用，同异相资，故甲国之学，即以先进之资格为乙国所师，乙国之学亦时以后起之变异为师于甲国，而学术即因转益相师而进步。”他也和杜亚泉一样，在中西文化问题上主张调和论。他那篇引起陈独秀质问的《功利主义与学术》，主要阐明文化结构的两个不同层次，即“高深之学与普及教育之关系”。鉴于时人多以功利主义蔑弃高深之学，他对此加以批评。他藉“儒学必有微言而后有大义，佛家必有菩萨乘而